

警惕日本强化情报能力建设

■王大宁



图①：日本航空自卫队装备的电子侦察机。
图②：日本自卫队队员在基地作战中心参加演习。
图③：被称为海底“窃听器”的日本响级声学测量船。
图④：日本自卫队演练发射12式反舰导弹。

制图：韩木

近期，日本加快情报体系改革步伐，自卫队和政府层面都在整合并新建专门的情报力量。此举被普遍视为战后日本安全体制的一次关键重构，其未来走向与地缘影响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。

突出“信息作战”权重

整合情报力量、强化信息作战能力，成为日本自卫队此轮调整的重点。

3月25日，日本海上自卫队新组建的“情报作战集团”在日本防卫省举行成立仪式。该集团约3200人，由海上自卫队下辖的承担情报、网络、通信及海洋观测任务的4支部队整合而成。海上幕僚长(参谋长)斋藤聪表示，此举旨在统一指挥原本分散的相关部队，强化对网络、太空、电磁及认知领域多源信息的处理能力，作为海上自卫队CISR系统的核心，支撑快速决策，并深化与美军信息部队的协同。

3月29日，日本陆上自卫队正式成立“情报作战队”，并在东京朝霞驻地举行授旗仪式。陆上幕僚长荒井正芳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，这支编制约80人的新部队将直接隶属陆上总队，整合此前分散在各部队的信息分析、舆论监测与情报搜集职能，专职负责信息作战、网络攻防与电子对抗。

评论认为，上述调整表面是强化情报能力，实则标志着自卫队开始着手建立统一的信息作战力量与指挥体系，更释放出清晰信号：日本防务战略乃至安全保障战略的重心，正从传统的物理空间持续向信息空间延伸。日本防卫省曾多次声称，信息作战是现代战争中“不流血的主战场”，它不是单纯的情报保障或被动的虚假信息应对，而是通过主动信息操控，影响社会心理、政治决策乃至系统性博弈。

日本自卫队上述认识及转型动态，与近年来北约各国强调的“混合战争”概念一致，其所针对的并非传统武装冲突，而是包括舆论引导、叙事塑造、信息

解释等在内的“灰色地带”竞争。这是日本政府近年来安全观念持续转向进攻性的鲜明体现，预示着日本的安保及防务战略将不断从“自然边界防御”向“塑造认知环境”延伸，更加注重遮蔽美化其历史罪行，淡化、推卸乃至否定战争责任，在思想意识领域适配和服务于“再军事化”进程。

扩编升格太空力量

3月23日，日本航空自卫队所属“宇宙作战群”(2022年3月成立)正式升级并扩编为“宇宙作战团”，规模从约310人增至约670人，并计划在2026财年内进一步升格为“宇宙作战集团”，人员增至约880人。按照防卫省规划，航空自卫队拟于2026财年底更名为“航空宇宙自卫队”。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声明，此项扩编将提升自卫队在太空领域的情报、监视与侦察能力。

日本太空军事力量从仅有20人的“宇宙作战队”起步，仅用6年时间，就从一个辅助性的监测单位即变为拥有独立指挥权限的作战集团。评论认为，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和规模升级，而是战略维度的跃升。“宇宙作战集团”预计将担负太空监视、数据分析、电子干扰乃至反卫星等任务，围绕太空导航系统和通信链路展开制信息权争夺。换言之，日本正在构建“空天一体”的作战体系，其侦察的“掩饰外衣”越来越稀薄，对抗的内核愈发暴露。

随着日本太空军事力量编制到位并完成向“常态化战斗值班”转型，日本将加速采购高性能太空探测雷达和部署小型低轨卫星群，为远程精确打击力量提供实时天基情报支持，并可能展示针对太空目标的软杀伤能力。

未来，日本将充当美军在亚太的“太空哨兵”，其太空监视数据可实时接入美军作战体系，推动美日军事同盟加速向太空领域延伸。

打造国家情报中枢

3月13日，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关于设立“国家情报会议”及负责具体事务的“国家情报局”的法案，计划最快在今年7月设立上述机构。4月10日，日本众议院内阁委员会开始同步推进两项议程：启动审议设立“国家情报会议”的法案，将出台“国家情报战略”。

“国家情报会议”将由日本首相担任负责人，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、外务大臣、防卫大臣等11名内阁官员，负责审议安全保障、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，以及与间谍相关的海外情报活动。该机构若如期成立，预计将在今年内发布日本首个“国家情报战略”，作为日本中长期情报政策的基本方针，以制度化方式规范情报收集、分析与运用流程。

日本“国家情报局”作为“国家情报会议”的事务性机构，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，并从现有情报机构调派人员充实实力。原内阁情报调查室负责人“内阁情报官”将升格为政务官级别的“国家情报局长”，对首相及内阁官房长官负责，可直接向首相汇报。该局将通过卫星影像分析、大数据筛选等手段开展情报活动，同时被赋予“综合协调权”，可汇集各职能部门的情报并进行整体分析。据报道，该局将成为日本未来情报收集与分析活动的指挥中枢，地位与2014年成立、直接隶属“国家安全保障会议”的“国家安全保障局”相当，被称为日本版“中央情报局”。

重蹈覆辙值得警惕

日本本轮情报机构调整，是强化情报能力的系统性转型，标志着日本正式开启情报体系的全面升级。这是日本架空“和平宪法”、推进新型军国主义、对外政策持续转向的配套动作和节点性制度布局。

近年来，日本右翼势力蓄意挣脱“战后体制”束缚。在2022年底出台的《国家安全保障战略》等“安保三文件”中，日本将“指挥控制与情报能力”列为国家防卫战略重点发展的七大能力之一，并提出构建“无缝衔接的情报收集体制”，更加凸显对抗性与进攻性。

此次自卫队情报机构改组，呈现出“适应体系联动、空间立体拓展、博弈形态升级”等特点，意在为自卫队发展所谓“反击能力”，进而主动介入区域热点问题提供全方位情报支撑。新设中枢情报机构和制定“国家情报战略”，则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国家情报综合体系：对内便于首相掌控各项事务，对外注重强化情报监控以支撑军事行动。日本全面对标美国情报体系，意在深度对接和融入美国全球情报体系，借势美日同盟延伸军事触角。

从近现代历史维度看，日本情报能力的发展进程始终与军国主义扩张深度绑定。日本情报权力高度集中和机构权限大幅扩容，已引发其国内舆论对于社会监控泛化、侵犯民众人权的深切担忧。日本《东京新闻》等媒体称，政府当前的一系列举措令人回想起二战前和战争时期——当时日本情报与治安机关凭借自身权力压制言论与思想自由，裹挟民众走向战争，最终将日本带向灾难。

日本急于修改武器出口政策

■李海

支撑“再军事化”，拓展“军事外交”

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，日本计划于4月内正式修改“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”，以全面解禁武器装备出口，此举引发多方关注和警惕。

此次修改是日本战后安保政策的重大调整，主要涉及3个方面：一是取消禁运区，废除此前“仅限于出口救援、运输、警戒、监视和扫雷5类非战斗用途防卫装备”的规定，原则上开放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所有武器出口；二是突破对象限制，为“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”设置例外条款，从而打开战时军售大门；三是弱化国会监督，将武器出口审批由“需国会事前批准”改为“事后报告”，决策权集中于以首相为首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。

近年来，日本已逐步放宽武器出口限制。2014年，日本以“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”取代1967年确定的“武器出口三原则”，实现从“原则上禁止”到“原则上允许”的转向。在此框架下，日本借机修改《自卫队法》，先后向菲律宾提供防空雷达及用于警戒和监视的二手巡逻艇、海警船等所谓“非杀伤性武器”。此后，日本多次修订“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”及其实施方针，逐步放宽对外联合研发与成品武器出口条件。2023年，日本向美国返销“爱国者-3”防空导弹，实现二战后首次出口杀伤性武器。2024年，日本允许日英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出口至其他国家，为大型进攻性武器出口扫清障碍。

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的直接目的，是全面复活本国军事工业体系，以支撑“再军事化”进程。多年来，日本极力扶持本国防务企业，但自卫队自身装备规模有限，本土制造武器无法通过大批量生产分摊研发成本，导致价格高昂，加之难以通过出口获得使用经验并改进性能，整体水平难以提升。据统计，近20年，有超过100家日本企业退出防务产业领域。日本政府意图通过开拓国际市场，形成“研发—生产—出口—再研发”的产业循环，为军备扩张提供经济与技术基础。

日本对外出口武器的深层意图，是强化与相关国家的军事合作，构建以日本为枢纽的亚太安全网络，推动防务战略从“保守防卫”转向主动介入。在当前西方军工业产能不足的背景下，若自卫队现役装备可列入出口清单，日本制造业的产能不仅将填补市场空缺，还可成为提升日本地区影响力的抓手。日本制造的苍龙级常规潜艇、10式主战坦克和12式岸基反舰导弹，以及按照“并行开发、共享技术”原则研制的新一代P-1反潜巡逻机和C-2运输机，均在出口候选名单之列。日本已与澳大利亚达成新一代导弹护卫舰出口协议，新西兰等国也表示有采购意向，甚至有美军人士建议美国采购日本新一代护卫舰。

与武器出口政策加速从“隐性突破”到“显性解禁”几乎同步，日本政府正为扩张产能和推销武器“铺路”。4月7日，日本出台“为强化持续作战能力而推进军民两用技术”的方针，意图在发生“突发事态”时，将民用小型无人机等生产平台迅速切换为防卫装备生产线，并利用民用技术加速导弹研发。另外，日本高层计划近期访问菲律宾等国，向后者推销护卫舰和防空导弹等武器。

评论人士称，日本武器出口政策若出现根本转向，将严重违背日本宪法和既有规范，破坏战后防范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制度性保障。日本的经济社会结构、科技发展方向乃至国家走向都将随之改变，地区战略平衡和安定稳定将面临严峻考验。



日本向菲律宾出口的雷达系统。

延伸阅读

日本计划调整自卫队组织架构

■观山海

4月初，日本政府表示，计划在年内修订《国家安全保障战略》等“安保三文件”时，纳入自卫队组织架构调整的内容。其中，精简“中间司令部”(即中层指挥机构)和提高女性自卫队人员比例，将是调整重点。

报道显示，日本于2025年3月新成立的“统合作战司令部”，在指挥协调、信息汇总等方面，与现有的“中间司令部”存在职能重叠，这被视为日本精简“中间司令部”的重要原因。

有分析认为，随着日本自卫队的防卫重心持续向西南方向倾斜，以及信息化、智能化作战方式的普及，部署在北海道的部队可能成为裁减对象。据统计，截至2025年9月，北海道地区驻有超过3万名自卫队人员，占自卫队总员额的约15%，其中以适合地面近距离作战的战车和火炮部队为主，“中间司令部”类别的机构占比较高。

根据日本防卫省规划，到2035财年，女性自卫队人员比例计划从目前的9.1%(约2万人)提高至13%以上，以接近北约成员国目前的平均水平(13.9%)。近年来，日本自卫队逐步放

宽女性任职限制：自1993年战斗部队开始接纳女性以来，已陆续开放护卫舰、战斗机、潜艇等岗位；至2025年7月，陆上自卫队化学部队也正式对女性开放。



日本自卫队队员在训练中装填迫击炮弹。

美日荷举行“风车卫士”联演

■王成文 叶广宇

3月20日至4月3日，美国、日本和荷兰在日本青森县的航空自卫队三泽基地及周边空域，举行代号“风车卫士”的首次三方联合空中演习。这也是荷兰空军首次跨洲飞抵日本进行演习。

从参演阵容看，美国空军派出2架F-35A与4架F-16战斗机，形成高低搭配的作战编组，兼顾隐形突防与常规空中作战。日本航空自卫队出动驻三泽基地的8架F-35A战斗机和1架E-2D预警机，并与北部航空警戒管制团联动，构建完整的空中侦察、预警与作战体系。荷兰空军派出5架F-35A战斗机和1架A330 MRTT空中加油运输机，以保障远程跨洲部署与空中续航能力。为适应日本气候及短跑道起降需求，荷兰的F-35A战斗机在机身背部上方加装了减速伞。

此次联演实战性强，针对性突出，课目涵盖空中对抗、编队作战、情报实时共享、应急协同等。依托F-35A的隐身性能、多源情报能力和数据链共享系统，三国战机实现了战场信息实时互通与指令同步，初步打通不同装备和指挥体系之间的信息壁垒，形成了空地一体的作战网络。

分析认为，此次演习不是单纯的战术技能磨合，而是在美国主导、日本配合下，北约欧洲成员国跨地区延伸军事影响力的重要一步，释放出美日拉拢域外势力、强化区域军事同盟、搅动地区安全局势的明确信号。

美国试图通过此次联演，进一步整合跨大西洋与印太盟友体系，完善其主导的排他性安全网络，推进“印太战略”。日本则一方面扮演美国“印太支点”角色，另一方面借引进欧洲力量强化自身威慑，并以“欧洲—大西洋地区与印太地区安全密不可分”为名，推动“印太



参加“风车卫士”演习的日本F-35A战斗机。

北约化”，谋求更大军事话语权。荷兰作为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，此次派遣主力战机跨洲参演，既是对美国战略的响应与绑定，也意在拓展自身海外军事存在、强化跨区域协作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4月中旬，北约派出规模空前的近30名大使级代表访问日本，被舆论视为“北约印太化”的重要步骤。在北约内部分歧不断暴露和扩大的

背景下，北约部分欧洲成员国试图通过强化与日本等亚太国家的防务合作，推动伙伴关系多元化，并与美国“印太战略”对接。随着更多北约国家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，日本可能以技术交流和联合演训等名义，针对某些敏感区域进行军事试探。这种跨区域、阵营化的军事联动，将增加地区军事对峙风险，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局面。